

我们存在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？

——“生态符号学研究”主持人语

赵毅衡

1998年,当代生态符号学“正式”成立,因为在《符号系统研究》(Sign System Studies)刊物上同时刊登了两篇文章,一篇是“新塔尔图学派”的领军人物、爱沙尼亚符号学者库尔(Kalevi Kull)的“符号生态学”(Semiotic Ecology),另一篇是任教于德国卡塞尔大学的著名符号学家诺特(Winfried Noth)的“生态符号学”(Ecosemiotics),两篇文章相辅相成,互相补充,宣告了这门学科的建立。

“符号生态学”与“生态符号学”究竟有什么不同呢?中文看起来的确不同:前者用符号学角度研究生态学,后者研究生态方面的符号学。但是在西文中,二者的区别并不清楚,我们试读一下这两篇文章就可以知道。为了简便清楚,我们就用“生态符号学”这个名称,实际上西文中Ecosemiotics这个名称也渐渐正式化。生态符号学是关于有机体及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符号关系的研究,所谓“有机体”,就是所有的生物。按照这两篇文章的详细回顾,这样一种“非人类中心”的符号学,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。但是生态符号学可以直接追溯到两位开创性的人物,一位是爱沙尼亚-德国生物学家-哲学家乌克斯库尔(Jakob von Uexkull, 1864-1944),这位德国贵族提出的“环境界”(Umwelt)理论,影响深远,海德格尔、舍勒、卡西尔、梅洛-庞蒂、福柯、德勒兹等哲学家都引用此概念。所谓“环境界”,就是一个有机物(例如一个阿米巴虫)作为主体所生存于其中的主观时空世界,这个世界靠符号意义构成。与之不同的是一个有机体居住于其中的客观世界,或许可以称之为“现世界”(Umgebung)。另一位是匈牙利-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(Thomas A Sebeok, 1920-2001)创立的“生物符号学”(biosemiotics)。他们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符号学的走向,尤其在“伦理符号学”(semioethics)中,而伦理符号学与生态符号学已经有合流的趋势。这两个学派,都是对一百多年来的符号学运动的突破。伦理符号学突破了主流符号学的形式论倾向,深入到道德、价值、责任等问题之中,而生态符号学突破了人类中心论,凡是“有灵之物”,都生活在符号意义构成的主观世界之中,他们与“意义环境”的交流成全了他们的存在。

我个人认为,在中国,我们依然应当把人的主观意识和文化精神,作为符号的意义世界的核心,因为我们需要建立人的主体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落后西方一步,而是中国文化的发展,需要我们的主体精神进一步高扬。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看到,人类不是孤立地生存于这个世界上;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许多事,包括让人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,已经让我们明白意义世界不等于人类世界。我们应当重新考虑:我们存在的边界,我们主观意识的“环境界”,其边界究竟在哪里?本期“生态符号学研究”专栏刊登的几篇译文,都是“生态符号学”的经典文献,希望引起国内学人的关注。